

200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匈牙利)

凯尔泰斯·伊姆莱 著

**VALAKI
另一个人**

MÁS

余泽民 译
冒寿福 审校

Ezerkénes szálkában érkeztem, ősz a hideg Duna
parton, a körökben alkony a zöld hűma faragott virágai
öntötték le a gyöngyökkel teli földet, a magaságban
kopott gyümölcsök.

Minden mélyben, modulatlanul álszik bennem.
Ugy kavargatott a réscimeti, gondolataimat, akár
egy autóra komoly, langos karánnyal.

Miben érzem a megtámadásra elvészettnek? Nyil-
ván, mert elvesztem vagyok.

Minden hamis öltözöm, az en reyenem, a létezé-
sem hamisítja meg!

Ha az ütésig idejben ütésig mi tömörítet vál-
ki, ez talán az eredetű is enged körverkezett. A Teremest szorongás elzette meg, a bármelyik
szíkkal tűnhet.

Tegnap egy nyilvános kiadóteremben, a széle
felett osztóban „Hungarian Jewish coexistence”-nek

I515.6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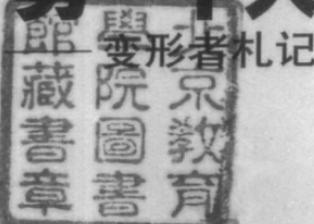
200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匈牙利) 凯尔泰斯·伊姆莱 著

余泽民 译 冒寿福 审校

VALAKI MÁS

另一个人



Walter Kempf

CAH 83/11

北京教育学院图书资料中心



0000146620

作家出版社

446940

(京权) 图字: 01-2003-3437号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Hungarian under the title VA-
LIKI MÁS. A VÁLTOZÁS KRÓNIKÁJA
Copyright © 1997 by Imre Kertész
published by permission of Rowohlt, Berlin Verlag
GmbH, Berli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另一个人 / (匈) 伊姆莱著; 余泽民译.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3.8

ISBN 7-5063-2738-4

I. 另… II. ①伊… ②余… III. 随笔 - 作品集 -
匈牙利 - 现代 IV. 1515.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73364 号

另一个人

作者: (匈) 凯尔泰斯·伊姆莱

译者: 余泽民

审校: 贾寿福

责任编辑: 朱燕 汉睿

装帧设计: 张晓光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t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eshu.com>

印刷: 北京乾洋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1230 1/32

字数: 80 千

印张: 4.5 插页: 4

版次: 2003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2738-4

定价: 12.00 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凯尔泰斯·伊姆莱

1929年11月9日出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一个犹太裔的普通市民家庭。1944年，14岁的凯尔泰斯被投到德国纳粹设在波兰的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后又被转到了德国境内的布亨瓦尔德集中营，直到1945年被苏军解放。

1946年在布达佩斯《火花》报社开始了最初的记者生涯，1953年开始自由撰稿人的写作生涯。先后写过三部音乐轻喜剧，并获得成功。六十年代初，开始创作第一部长篇小说——《命运无常》。1975年，以自己少年时代在纳粹集中营的经历为素材创作的自传体小说《命运无常》经过了近十年的辗转努力，终于得以出版。

六七十年代，翻译了大量的德文作品，其中主要有尼采、弗洛伊德、维特根斯坦等。

1977年发表两部中篇小说《寻踪者》和《侦探故事》，之后相继出版长篇自传体小说《惨败》、《为一个未出生的孩子哭祷》，中篇小说集《英国旗》，日记体文集《船夫日记》及《另一个人》，思想文集《被放逐的语言》与电影剧本《命运无常》等。

曾获德国布莱登堡图书大奖，匈牙利最高国家文学大奖——科舒特奖，德国语言与诗歌学院一等奖，莱比锡书展大奖，德国国家最高文艺奖等多项国际大奖。

2002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翻译：余泽民

匈牙利《联合商报》主编、奥地利《中欧时报》编辑、匈牙利记者协会会员。

1989年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系。随后考入中国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攻读艺术心理硕士研究生，从事艺术美学与心理学研究。

1991年赴匈牙利工作，同时攻读匈语，研究匈牙利文学。十多年来一直从事匈牙利及中东欧当代作家的文学翻译工作。先后翻译了匈牙利、捷克、南斯拉夫、波兰等当代作家的小说三十余篇，与匈牙利著名哲学家、作家库拉琼尼·卡博尔合作的匈文全译本《道德经》和《易经》（三卷）于2003年相继出版。现定居布达佩斯。

审校：雷寿福博士

语言学家。现任匈牙利政府官方翻译、国家翻译考试中心考官、匈牙利中文翻译协会名誉会员。

1950年考入北京大学俄语系，同时学习匈牙利语。1954年毕业后留校担任助教，并开始从事匈牙利文学的介绍工作。

1959年随夫著名汉学家高恩德赴匈定居，并加入匈籍。几十年来，一直在布达佩斯厄特沃什·罗兰大学中文系任教，讲授现代汉语、古典文学和翻译课。1980年在该校获得语言学博士学位。先后翻译或合译过《裴多菲诗选》、《尤若夫·阿提拉诗选》、《尤若夫·阿提拉小传》、《夜莺》、小说《我是证人》、《巴尔街的孩子们》和《爱盖尔之星》等匈语作品。还参加了《匈汉大词典》的编纂工作。

Károly Ernő

“……因为，我是在描绘自己。”

——蒙田^①

“……尽管我从来就没有存在过，我幽然易逝、幻影无形地徘徊在一个永远不可能成形的一个人的梦乡里。”

——佩索阿^②

“‘我’：是一个我们顶多可能成为他的合著者的家伙。”

——凯尔泰斯·伊姆莱

“……我：是另一个人。”

——兰波^③

① 蒙田（1533—1592），法国十六世纪怀疑主义哲学家、散文大师。著有《蒙田随笔》。

② 费尔南多·佩索阿（1888—1937），葡萄牙作家，著有《惶然录》。

③ 兰波（1854—1897），十九世纪法国天才的象征派诗人，被誉为法国现代派诗歌的先驱。

Károly Erőss

一九九四年秋天，寒冷的多瑙河畔，黄昏初始的天空，将青苹果一样酸涩的颜色泼洒在佩斯一侧的、在神气十足的谎言中变得破旧斑驳了的宫殿上。^①

所有的一切都深深地、静谧地沉睡在我体内。我的情感与思绪如此纷乱错杂，就像是满载的一车温热的沥青。

为什么我会如此深切地感到自己的失落？显然，因为
我是一个失落者。

一切都是伪造的（通过我，在我的身上：我的存在伪造了一切）。

假如这种空虚（内心的空虚）变成了犯罪感的话，也许可以追溯到事发的起源。焦虑超过了上帝的造化，空虚的恐怖，是道德的事实论据。

昨天，在一个公共的演讲大厅里，在一个被极为愚蠢地命名为“匈牙利人与犹太人共存”的愚蠢至极的会议上，有一位老先生朝我径直走过来，他的神色混沌，不成形状，头发稀疏，隐现在脱发之处的秃斑，看上去就像是带扶手的绒布座椅上脱了绒的地方：我在他脸上找不到一丝熟悉的轮廓。他突然令人惊诧地跟我拥抱，随后自我介绍说：他是我的一位“已经三十五年没有见面了的朋友”，他侨居国外。他听到过我的消息，读过我的书。他

① 布达佩斯是匈牙利共和国的首都，蓝色的多瑙河穿城而过，将城市分隔成布达与佩斯两部分。

Beata Erzsébet

说，他对“我的转变”感到纳闷。当年，他在我身上并未察觉到丝毫的特别之处，我一点也没显露出所谓的“较为出众的能力”。虽然，我对这个突如其来的话题为自己做了稍许的辩解，但是，他的那些话最终还是搅乱了我内心的宁静。直至今天，我都一直乐于将自己视为一个从某种角度来说总在不懈努力、对任何事物都能保持清晰目光的人。到底什么是我“较为出众的能力”呢？我没有追随这个国家的惟一感召：这种感召，表现为一种好似“激励人们在精神上、心灵上，乃至肉体上自杀的汽笛声”的、无休无止的诱惑；这种感召，具有生命的活力。这种所谓“胜利的最底限阈”，不仅极难估算，而且完全缺少预见。现在，究竟“变化”发生了什么变化？难道我们不会再继续地听人摆布？莫非是我们自身发生了改变？所发生的变化，不过是归还了少得不能再少了的生存条件，即“个体的自由”——牢房的门“吱呀”一声打开了，我在这里已被囚禁了整整四十年，可以想象，这一声“吱呀”就足以使我惶惑不安。我们不能在自己当过奴役的地方品尝自由。我们必须离开这里，必须去很远很远的地方。但是，我做不到。

因此，我自己需要重新诞生，变形——究竟要变成谁？要变成什么？

细雨霏霏。一个男人正坐在一家饭店的餐桌旁向一个

江山易改

女人解释着什么根本就不可能解释清楚的事情。他想放弃自己总是不断受挫的、对幸福的尝试。在一条条通向空虚的、充满允诺的迷途上，他已经厌倦于对欢愉的追猎。这不是另一个女人，上帝有眼，当然不是。这是自由。一种“相牵相随的关系”终于从多年来激转的浑浊旋涡中浮出水面。他感到厌腻，在所有的关系中，他所能意识到的只有对自己的不满。一条短暂、激烈、具有创造力的生命在他的体内浮现。对忠诚与职责的倔强恪守，是长期抑郁症的滋补之火。这把火是冷的，冷得就像一块冰；然而，“满足”却燃烧其中。“Was wussten sie, wer er war.”（德文原意为：“谁能知道他曾经是谁。”）没有人知道他是谁，没有人知道他渴望抱着自己的秘密孑身独处。女人露出一副倾听的神情。现在，她本该站起来，本该晃着高傲的肩膀，强忍呜咽地离开这里，但是她没有起身。这时，男人想从座位里跳起来，想温情地、飞速地吻一下女人的眼睛，然后匆匆离开咖啡厅，但是他没有这么做。招手，付账。两个人同时从桌边站起。透过雨水吹打的玻璃窗，我们看到两个人走到街上。男人将雨伞撑开，他们肩并肩地朝前走出几步，女人终于挽住了男人的胳膊，之后，他们经过一段时间笨拙的努力，终于调整好彼此的脚步。一股清新的气流从店门上方穿堂吹过，如同一阵一飘而过的、徒劳的痴笑。

Walter Benjamin

细雨霏霏。前任党委书记正在电视里发表讲话。人们“相信”党，“相信”所发生的“失误”和“错误”，然而人们也“相信”：比如说，对于这里发生的一切，“斯大林并不知情”等等。但是，用不着相信，他们不能把这些陈词滥调与真正的实质相混淆；用不着相信，他们不能将所谓的“信仰”与真实的思想或情感混为一谈。可以汲取的教训是：这些人使我们的生活建立在一片毒言恶语之上。而且更有甚者，他们还为这些毒言恶语洗礼，将之演变成了一种合法的“大一统思想”。他们的下台，将一群惯用毒言恶语的“残疾者”遗弃在身后，这些人需要紧急的“道德抢救”，他们的言语就如同一团被撕得粉碎的纸屑，似乎突然丧失了毒言恶语的价值，突然暴露出自己道德的伤疤。道德的假肢“咯吱”刺耳，道德的拐杖“嘎嘎”作响，道德的残疾车正在转动……这一切，我只是冷眼旁观。这并不是说他们需要像忘掉一场梦魇似的忘掉一段历史的岁月：想来，这场梦魇曾是他们自己，假如他们想要活下去的话，他们要忘掉的是他们自己。事实上，谁也未曾调查过：对一个经历了长久死亡的人来说，“重生”——到底还有没有可能？到底还有没有吸引力？在什么时候有谁重生，这不是在宣布奇迹，只不过是要继续活下去，继续苟活下去；从本质上讲，这与至今为止的“活着的目的”（即“不为任何目的”）并没有什么两样，莫

Walter Benjamin

非人们根本就未曾意识到这次“重生”的体验？能不能想象，让拉扎尔^①扮演卓别林^②的角色呢？

潮冷刺骨的悲剧之风正在呼啸。大地崩裂，苍穹塌陷。人们都突然变形，萎缩，衰老。地狱的喘息吹掉了人们脸上的色泽。一条条灰色的行影、一具具苍白的尸首在街巷里幽行。这是灾难的变形。在血染的原野上，他们在上满彩釉了的昆·贝拉^③塑像旁踯躅，我恍然明白了，我看到的是自己青年时代的懦弱、愚蠢、盲目和一种——归根结底——与自杀相仿的、不可理喻的悲剧生活，事实上，无能为力也能以一种尊严的方式变形。这里边存在着某种尊严，一个人最终遵从了屠杀的指令，带着某种平和忍耐着，等着被点名，被杀戮。在这种安逸之中，在这种牺牲品的安逸之中，存在着某种伟大。就我而言：今天，我已经预料到自己将要继续坚守岗位，顶多让自己的厌恶与日俱增。长寿，似乎为我们收藏了许多的惊喜——我们自己为自己制造的惊喜。

“我们要尽可能深远地接受我们的生存。”黎尔凯^④

① 《圣经》里，拉扎尔是穷人的象征。

② 查理·卓别林，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喜剧大师。

③ 昆·贝拉为匈牙利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

④ 黎尔凯（1875—1926），德国著名诗人。

Kurt Vonnegut

说。卡夫卡^①说：“我要多多地孤身独处。我取得的所有成绩，只不过都是孤独为生的结果。”尼采^②说：“距离感……”

到底什么是正当的生活？这是一个永远的秘密（对我来说）。

昨天晚上，我躺在床上，重又绞尽脑汁地试着对“自己并不存在”的假设进行了长久的冥想。没有任何的主观臆断。我几乎感觉到，自己游离出自己的肉体——但是，历险也就到此结束。一旦我丢掉了自己的躯壳，内容也就随之消失，所有的一切都留在了那里。我的生死与我的肉体紧密相系，有的时候，这句陈词滥调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如果我以为“我的生活属于自己”的话，那么我将犯一个错误。但是，如果我忽视它、抛弃它、将之废弃、把它掩埋的话，那么我将铸成一个更大的错误。这个生活已被托付于我——我不问“是谁将它托付于我”，因为我知道这个答案；而且我还知道，这个问题的提出就是虚假的；我只有倚仗于自己和自己无可争议的责任感（就跟倚仗于惟一的感觉经验一样）。我与自己的生活处于一种相

① 卡夫卡（1883—1924），奥地利作家，后现代主义文学的鼻祖。出生于捷克布拉格的一个犹太人家庭，因此，他像凯尔泰斯一样，终身都背负着这个沉重的十字架，始终生活在社会的阴影之中。卡夫卡的作品和人格对凯尔泰斯影响至深。卡夫卡的主要作品有《变形记》、《审判》、《城堡》、《判决》等。

② 尼采（1844—1900），十九世纪德国著名哲学家。

Lauren Szabó

互依傍的关系之中。这个关系的名字是：屈从。至今为止，并没有遇到什么问题。但是，在那个破碎了的生活中，到底哪个碎片是那个自称的“我”呢？

“‘我’：是一个我们顶多可能成为他的合著者的家伙。

‘我’：是另一个人。”（兰波）

“一九五一年四月九日。‘你是知道，还是只是相信自己叫做路德威格·维特根斯坦^①呢？’这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吗？”（维特根斯坦：《谈“确凿无疑”》）

在一九五一年四月九日，在四十四年前的今天，我到底做了些什么？想来，当时我作为一名“被开除了的知识分子”，正在一家名为“匈牙利国家钢铁厂”的金属机械厂里工作。那时候，我是知道，还是只是相信自己叫做“凯尔泰斯·伊姆莱”呢？

我既不知道，也不相信。如果有人叫我的名字，我只是简单地顺从。

我始终痛恨自己的名字。早在童年时代，这个名字就浸染了太多的屈辱。

如果我想准确地说：我想，我惧怕自己的名字。即使现在，我对它都心怀余悸。

① 路德威格·维特根斯坦（1889—1959），奥地利著名哲学家。

Kurt Gödel

当我听到有人叫我“凯尔泰斯·伊姆莱”的时候，当我看到有人写下“凯尔泰斯·伊姆莱”这个名字的时候，简直是要我将自己从一个宁静的、隐姓埋名的藏身所里拽出来。然而，我永远不能将自己与这个名字相对应。

（话说回来，事实上，托尔斯泰^①早在他的少年时代，就已经像一只小狗似的陶醉于自己的姓名了。）

我到达维也纳的感觉，就好像是从自己的生活里逃离出来。我翻译维特根斯坦的作品（《杂论》），就好像是逃离自己的任务。

一九九二年微寒的冬季。在初降的黄昏中散步。拜尔威德莱公园^②卡洛伊教堂附近。听上去让人联想到悦耳的银铃声的阿根廷大街。一座座造型宏伟的宫殿，在一个门洞里，藏着一家出售印度尼西亚首饰、弯剑和奇特装饰品的隐蔽小店。阳光下（这时一些非常古老的词汇在我的脑际闪现，比如说“晚祷”），在晚祷时分（究竟什么时候是“晚祷时分”？），我透过开向皇家庄园的窗子朝庄园院内眺望。空气里散发着一股酸溜溜的气味，路上行人稀少，夜幕中黎明的色彩，一种孤独，一缕轻烟——这一切，这一切的一切，宛如孩提时代长长的、忧伤的、梦样的午后。

① 托尔斯泰（1828—1910），俄罗斯文豪。

② 拜尔威德莱公园位于维也纳市内。

Walter Benjamin

在这座城市，维也纳夜晚的寂静与古朴仿佛是某种暗喻，在我的体内……可以这么说：勾起回忆？

我想，我一向喜欢这样地活着：在一个租赁的公寓里（这套公寓不属于我的），在舒适的家具中间（这些家具不属于我的），无家可归地独自做着自己要做的事情（此刻，我在翻译维特根斯坦的著作），不受任何基本生存问题的困扰，在一个陌生的地方，让内心的感触伴着一些——可能是对某些从来就不曾存在过的事物的——记忆……

虽然在维也纳找不到维特根斯坦的足迹，然而在他身上，在维特根斯坦身上，到处都能够找到维也纳的印记。自由，到了堕落的地步：犹太民族的自我怨恨（事实上，关于“反犹太人主义的形成及其行动”的研究在这里可以达到一个最高贵、最高深的水平）；通常，这种自我评价的惶惑不定，就像父亲、或者国家的皮靴靴底的“致命践踏”，当毁灭性的敌视达到一定极限的时候，这种“致命践踏”就会突然变得高效多产，从而成为创造者——思考，就像一种逾越的尝试；思考，就像一种复仇，就像一个亡命者充满轻蔑与恍悟的再一次回眸。

他说：“马勒^①是位蹩脚的作曲家。”我一边翻译着

① 古斯塔夫·马勒（1860—1911），奥地利著名作曲家，犹太人。

Walter Benjamin

这样的蠢话，一边将“第六交响乐”的磁带插进录音机里。托马斯·本哈德^①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与他的表弟保罗相反）：路德威格·维特根斯坦是一个乐盲（“unmusikalisch”——德文原意为“没有音乐细胞的人”）。但是，这句话还有弦外之音。“播种思想是一回事，收获思想则是另一回事。”这是我从《杂论》中翻译的话：可以这么说，维特根斯坦不愿意“收获”马勒的思想，我认为他之所以不愿意这样做，是因为马勒是一个犹太人。对一部作品的误解竟是如此容易。或者说：艺术作品竟是如此地不堪一击？不，它们实际上比这个还要脆弱易伤。所有的理解都是误解。我们能否这样说：是误解维系着艺术作品的生命？不，这么说，是不太可能的。

这是维也纳给我留下的第一个清晰记忆的、图解似的梦像。感觉不佳，自卑自贱，焦虑不安。可以说，这与昨晚所读的文章有关（文章刊登在《纵横》杂志上，标题是《反犹太主义的拯救者》），另外，还跟维特根斯坦与自己的犹太民族性相系的不幸牵联有关。今天早上，我突然发现了一个典型的翻译错误：“这是一个可以预期的矛盾冲突，”我写道，“即一个人在自身保持一种指向自身

① 托马斯·本哈德（1931—1989），二十世纪奥地利著名诗人、作家。



肉体的、古老美感的同时，还满怀喜悦地感激于囊肿（维特根斯坦用“囊肿”比喻“犹太民族性”）。当然，正确的翻译是这样的：“这个矛盾冲突突然要求一个人在自身保持一种指向自身肉体的古老美感的同时，还应该满怀喜悦地感激于囊肿。”我指的这个翻译错误，显然是弗洛伊德^①式的潜意识失言，他表明了，我实际上在期待着什么……

但是，我从自己身上期待着什么呢？我该怎样对待我的这些毕竟还是从囊肿角度审视一切的梦呢？

彻夜难眠，今天早晨——就跟平时的每天早晨一样——我又从那块镶嵌在普林兹·欧根大街一侧屋墙上的“莫里茨·施利克^②纪念牌”前走过，与其叫它屋子，不如称之为“公寓宝殿”。由于与维特根斯坦有关，所以我在第一次经过这块“纪念牌”的时候就曾驻足。即便我在布达佩斯看到这样一个给人以空灵感的名字的话，肯定也会感到奇怪的。莫里茨·施利克是被他的一个“不喜欢犹太人的学生”（可能也是个坏学生）开枪击中头部，丧命于大学的集会大厅里。由于这个暴行并不完全符合当时（一九三六年）奥地利的相关法规，这名学生被判处了十年有期徒刑。

① 西蒙·弗洛伊德，奥地利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

② 莫里茨·施利克（1882—1936），德国哲学家，由于他的犹太人身份，于1936年遇刺身亡。